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1939：茶马贾道 I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经费专项资助出版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1939：茶马贾道 I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经费专项资助出版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浙江摄影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王嘉文 方 妍

装帧设计：张 磊

责任校对：高余朵

责任印制：朱圣学

项目策划：王玉龙

本著作系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I, 1939 : 茶马贾道 / 孙明
经摄 ; 孙健三著. — 杭州 :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0. 1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ISBN 978-7-5514-2585-8

I. ①孙… II. ①孙… ②孙… III. ①新闻摄影—中
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42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4497号

ZHONGGUO BAINIAN YINGXIANG DANG'AN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SUNMINGJING JISHI SHEYING YANJIU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1939: CHAMAGUDAO I

1939：茶马贾道I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6.75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2585-8

定价：138.00元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序

孙明经和他的1939年 ——历时160多天的茶马贾道影像考察纪实

孙健三

从1939年6月开始到12月底，一位名字叫作孙明经的28岁的年轻学者，风餐露宿，几度冒死，手握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历时160多天，带着几十位学界泰斗列出的考察课题，翻雪山，涉激流，行程超过万里，进行了一次用电影和照片记录成果的茶马贾道科学考察……

孙明经是谁？

中国电影家协会前主席李前宽讲：“孙明经老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孙明经的弟子——我国电影摄影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沙占祥教授讲：“孙明经是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

孙明经既是一位科学家、文化人，又是一位教育家和遍旅华夏的科学考察者。他在34岁之前有过4次行程超万里的用电影与照片拍摄记录的实证考察。他在36岁之前，独立摄制了63部被各方学者称为“十分珍贵”的电影与多达数万幅的实证科考照片。

孙明经1939年6月从重庆出发，12月底返回成都，历时160多天的茶马贾道考察，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和认知茶马贾道留下了丰富的动态和静态的影像史料，更为今天如何用好这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财富留下了宝贵的思考空间。

用孙明经本人的话讲：“我是一个教师，一个传播者，一个文化与教育思想方法的研究者、传播者和译荐者。”

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

——忆孙明经

撰写：沙占祥

孙明经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籍山东掖县。父亲孙熹圣和母亲隋心慈是中国早期大学生，毕业于著名的齐鲁大学之前身——登州文汇馆大学部。文汇馆大学部初办时为吸引中国学生，大力宣传其独具的三项办学特色：照片、望远镜、显微镜。这三样东西引起孙明经父母的强烈求知兴趣，从而报考了登州文汇馆。

文汇馆的课程中有光学，洋教员在光学课中讲解照相原理，并在其他课程中用照片做教具介绍世界各国风光、人物、国情等内容，从而使孙熹圣、隋心慈对照相产生了很大兴趣。

孙熹圣可以说是最早与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第一次看电影和使用电影机是1898年，他成为第一个把外文“CINEMA”译为中文“电影”的中国人。1903年，他成为最早在中国大学课堂中放映电影的中国教师，他也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的“校园电影”的推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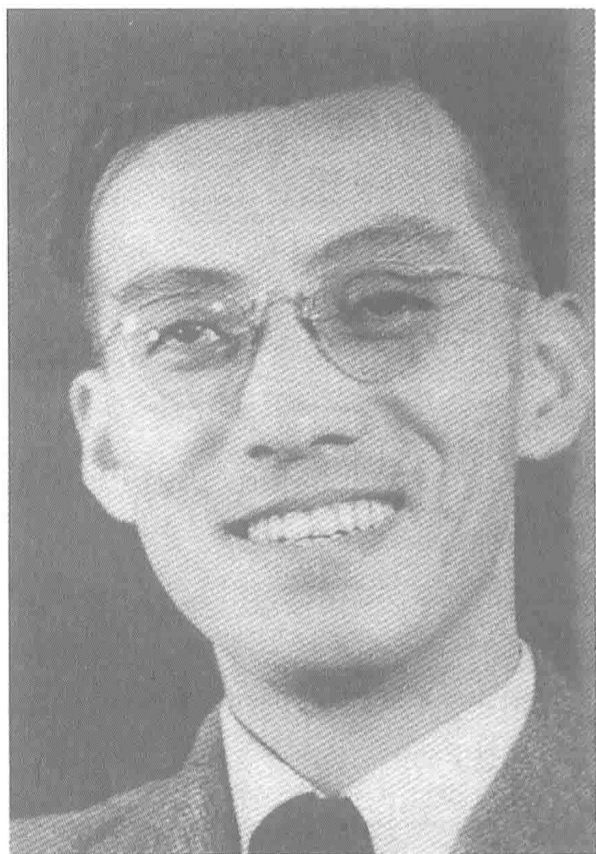


图1 本图选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德艺双馨的艺术院校名师》一书，这幅照片也在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时光留影》一书中被引用。

梁小初 凌純聲 翁文灝 陶孟和
 孫明經 程其保 程時燧 程希孟
 張其昀 張道藩 張鈺哲 張洪沅
 召集人：顧頡剛 孫明經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第六編 學術文化 第六章 國際文化合作

(7) 推行廣大的研究計劃，研究關於基本教育之原則
 方法技術資料及組織等問題；

(8) 充實訓練從事基本教育工作人員之設施，實施訓
 練，學校應即成立，原有之師範學校，應增加有關基本教育之
 訓練；

(9) 一永久性之聯絡機構應即成立，以繼續本會職所
 發動之各項工作；

(10) 各國家及區域應將各單位推行基本教育之進展
 情形及活動，隨時報告聯教組織以期互相交換經驗，聯教組
 織應印行一種關於基本教育之通訊；

(11) 凡參加本年十一月在墨西哥城舉行之聯教組織
 大會之國家應選派一富有經驗之基本教育專家代表參加。

第四日 聯教組織中國委員會

依照聯教組織約章第七條之規定，各會員國應設立
 委員會以與該組織工作發生聯繫。教育部長於三十六年四月
 間開始籌備並聘請吳有訓、陳本棟等二十一人組織籌備委
 員會，推定委員一百二十人，八月初籌備就緒，八月二十八日
 舉行成立大會。出席委員有胡適等七十三人。本屆大會主要
 任務：(一)通過聯教組織中國委員會組織規程，(二)選出中
 國委員會執行委員十人，(三)議定以後各屆委員產生辦法，
 (四)決議比照聯教組織職務之分類設立六個專門委員會，
 (五)討論今後如何加強聯教組織與我國政府及教育科學
 文化團體間之聯繫。茲將中國委員會委員、執行委員、暨各專
 門委員會委員名單如次：

一 中國委員會委員名單

王世杰 田培林 李石曾 李惟果 李濟 朱家驊 竺可桢
 陸本棟 李書華 程其保 任鴻衡

二 中國委員會執行委員名單

陸本棟 李書華 程其保 任鴻衡

三 各專門委員會委員名單

(甲) 自然科學委員會
 委員：陸本棟 任鴻衡 梅貽璜 吳有訓 竺可桢
 召集人：陸本棟

(乙) 社會科學哲學及人文科學委員會
 委員：蔣夢麟 周樹生 杭立武 陶孟和 程其保
 召集人：陸本棟

(丙) 教育委員會
 委員：程其保 陳鶴琴 常道直 朱經農 劉菊農
 召集人：程其保

(丁) 大眾傳播委員會
 委員：陳禮江 黎錦熙 顧頡剛 顧毓琇 孫明經
 召集人：顧頡剛

(戊) 藝術及博物院委員會
 委員：李濟 雲同禮 蔣復璁 陳植 凌純聲
 召集人：李濟

(己) 藝術及文學委員會
 委員：張道藩 陳之佛 余上沅 吳伯超 陳和義
 召集人：張道藩

附錄一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約章
 締結各國政府代表各人民宣言，戰爭既終，應於人心
 故和平之變遷仍須建築於人心。
 自人類有史以來，世界各民族間之睦於彼此關係及生

图2 (左) 和图3 (右) 1947年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左图是第一
 届委员会120位委员的名单和6个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右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
 委员会6位中国委员的名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委员会的成立与中国委员的入选，
 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在我国的开启，也标志着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使命结束。左、右图
 中均可见孙明经的名字。



1946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1947年，包括孙明经在内的120位当时中国各学科门类的泰斗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中国委员会委员，孙明经还是该组织大众传播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之一。

一、国难与中国教育电影运动

1895年，日本人从我国抢走台湾后，1931年9月18日，又开始从我国强抢东北三省全境。1932年，日本人进攻上海，挑起淞沪战争。1933年，又在长城一线大举进攻……图5记载了自1879年开始日本人强抢我国领土的过程。1931年、1932

图4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分卷封面，图2的内容原载于该卷第106页。

图5 1936年全中国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几乎人手一份的《国难地图》。





图6（左）、图7（右）、图8（下） 1936年的《南京日报》上有关当时我国开展“强迫成人识字教育”报道的标题剪报3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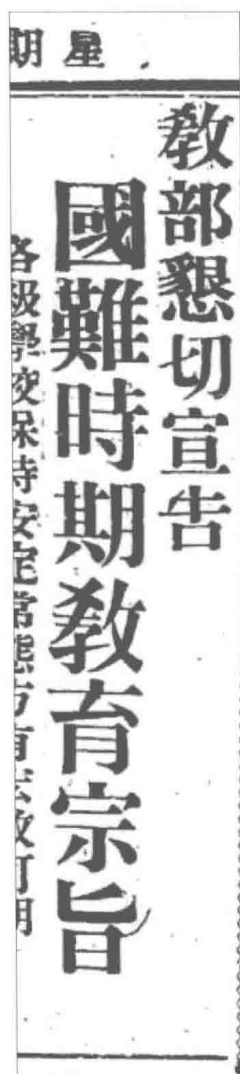


图9（左）、图10（右上） 当时《南京日报》有关教育界提出国难时期教育方案报道的文章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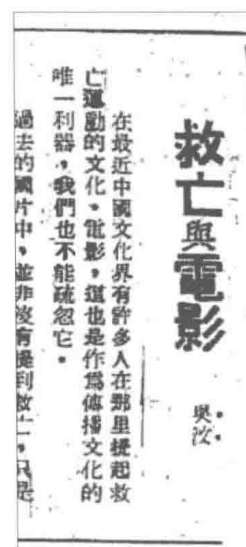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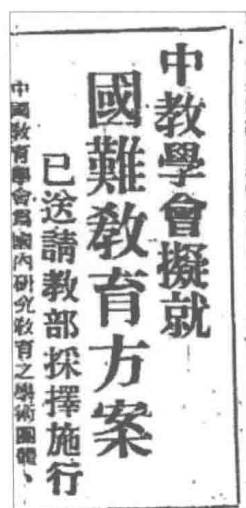


图11（右下） 标题为《救亡与电影》的报道，刊载于《南京日报》。

年、1933年、1934年、1935年……日本人逐年加大对我国领土的抢夺和对我同胞的杀戮。至1936年，日本人抢夺我国土已超过百万平方千米，杀戮我同胞数量已过百万。面对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戮，“救亡”成为那年月除汉奸以外全体中国教师无一不呼的口号。要救亡，必须“唤起民众”。学界泰斗蔡元培讲：“……写了书、出版了报纸刊物，可百分之九十的同胞是文盲！”就连一条简单的标语，90%

的同胞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办？

中国教师们想出一个办法——大范围开展“强迫成人识字教育”。一时间，各式各样的“强迫成人识字教育”的办法纷纷出炉。从当时《南京日报》的几份剪报中，可见中国教师们的一片拳拳爱国苦心。

当时，一方面日本人加紧侵华步伐，“唤起民众”“群起救亡”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强迫成人识字教育”难以一蹴而就。国难重重之际，到底如何才能“唤起民众”“群起救亡”成为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头等大事，一时间，各式各样对“强迫成人识字教育”的举措和对《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讨论与提议，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教师们最热议的话题。

面对日甚一日的国难，必须找到一种不借助文字并且能大范围、快速度、易见效的“唤起民众”的方法，“救亡与电影”以及“用播音”和“发展电影教育唤起民众的方法”被提上日程。

图14为1936年3月25日起正式成为当时国家政策的《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部分内容（放大），可见“推广播音教育”“促进电影教育”是当时的国家政策。

1932年7月8日，在中共地下党员郭有守和陈翰笙的发动下，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蔡元培担任第一届主席。内容丰富精彩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为救亡而开启。

1931年，蔡元培、郭有守师生二人在筹划推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幼立志“要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大学生孙明经。

孙明经的勤奋、能干与敬业，得到蔡元培和郭有守两位学界泰斗的赏识，从此二人视其为弟子和助手。



图12（左）、图13（右） 1936年《南京日报》有关日军对我国肆无忌惮侵犯的报道的标题。



图14（左）、图15（右） 关于郭有守起草的《国难时期教育方案》从1936年3月25日起正式成为国家政策的报道。

在学界泰斗们的引领下，孙明经的才华与抱负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中得到了施展的机会。

孙明经不仅拍摄了大量优秀的教育电影与摄影作品，还成了我国电影高等教育、摄影高等教育、播音高等教育、电视高等教育领域的第一位专职大学教师。

在为救亡而兴起的“教育电影运动”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文盲，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野，大字不识一个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看电影或照片，自然明了了“救亡”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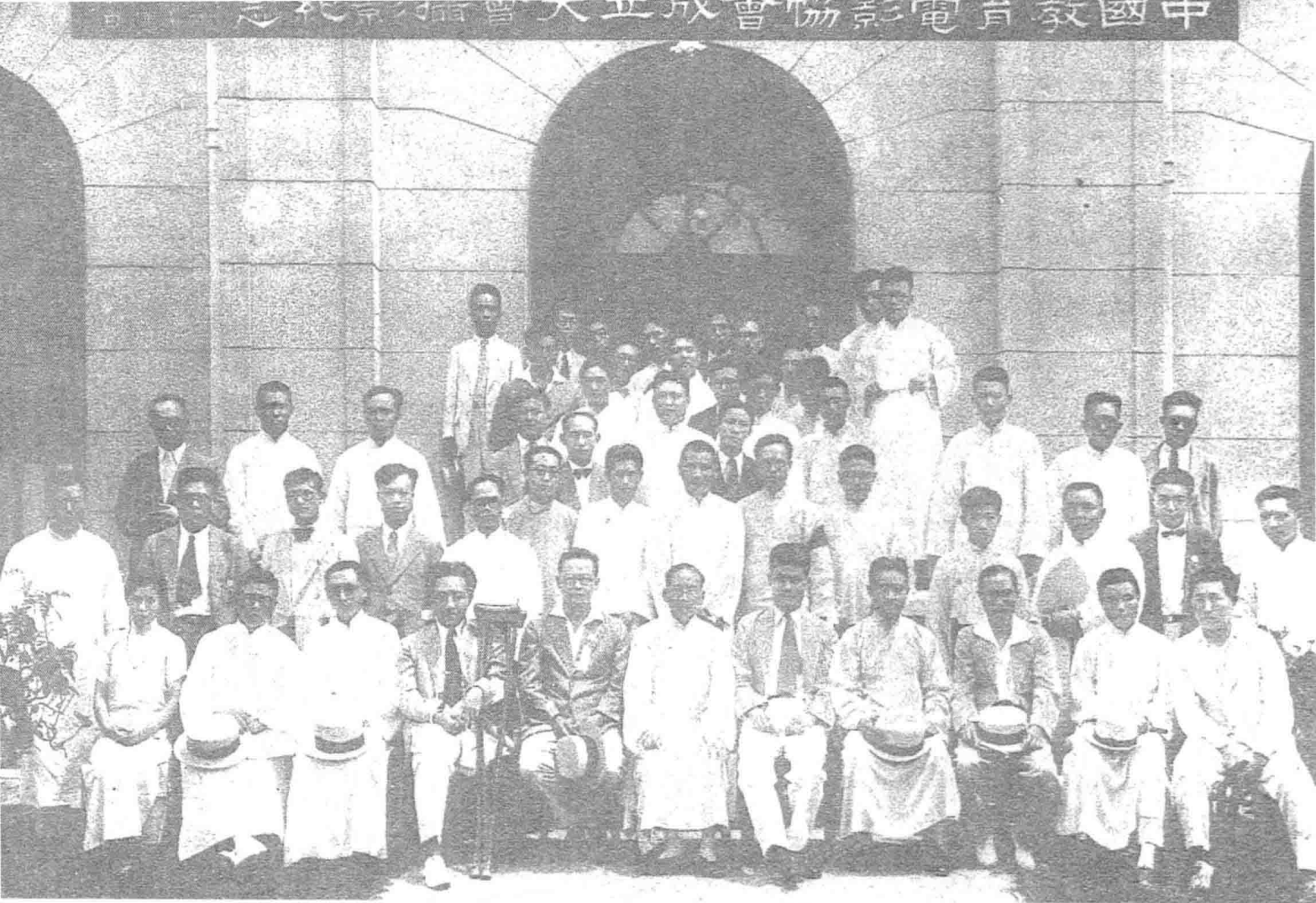


图16 1932年7月8日，由中共党员郭有守、陈翰笙发起，蔡元培担任首届主席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成立大会后，与会主要成员簇拥在蔡元培（前排中）身边合影。（孙明经摄）

图17 郭有守1935年4月出版的《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一书的封面。

二、“茶税救国论”促成1939年的“西康考察热”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发动了七七事变，企图灭亡我国。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开始了历时五年半的著名的重庆大轰炸。1939年，广州、武汉、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东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仅存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西部辽阔地区。长期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来讲，考验的不仅是军事的战略战术、民心和政治，更是经济与物资的保障能力。

我国中东部的广大地区及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太原等大城市、大商埠，历来是国家的税源。1939年，武汉以东大片国土落入日寇敌手，中国长期抗战的财政税源何在？

“中国要坚决地继续打下去，今后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多收一点税款？”这一问题能否成功解决，成为能不能“坚持抗战”“救亡到底”的重大课题之一。

要坚持抗战，前方当然要有几百万正规军苦战，他们要武器，要被服，要粮饷，要辎重运输，要通信保障，要医疗救护……哪一样少得了钱！

要坚持抗战，后方当然要有千万计的在校师生和工人，也要保障民生，要建设，要办工厂，要办内外宣传……哪一样又少得了钱！

1939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顽强地打了八年，“坚持抗战不能不花和越花缺口越大的钱要到哪里再多收一点税款补上”这一个重大课题，摆在抗日大后方一切坚持抗战的中国人面前……

1939年之前，中国历朝历代政府的财源中，最稳定的收入即盐税、茶税、铁税和国家金银矿开采。

《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起草者是法学家郭有守博士。1938年，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已经成为统管全四川教育的教育厅厅长，他学识丰富，深谙救亡与税源之道。刚刚从南京撤退到重庆的孙明经作为他的弟子，1938年4月刚一到达就被安排带着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奔赴四川富顺县的自流井地区和荣县的贡井地区考察拍摄。此两县的产盐量和盐税收入历来占到全四川产盐量和盐税的近70%。孙明经的考察结果，形成了由电影、照片和文字等诸多形式组成的考察报告。其中，科考纪实调查

电影《自贡井盐》的成功拍摄，一方面使人看了电影之后对自流井和贡井地区的盐业生产与税源情况一目了然，增加了抗战的信心，另一方面，当时自流井和贡井尚分属富顺县及荣县，并无“自贡”这一地名，《自贡井盐》的广泛放映，对其后“自贡市”地名的确立，也产生了有趣的影响。

1939年，不仅正面战场在用钱方面大大吃紧，作为“大后方最大教育区”的四川，教育经费方面也极度吃紧，身为教育统管者的郭有守博士不得不把他那高瞻远瞩的目光对准了茶马贾道——这里自我国西汉时期起，已经在汉、康、藏各民族同胞的共同培育中发展了两千多年。

在郭有守博士的提倡和具体推动下，以资源委员会和四川省教育厅的名义，在“茶税救国”的理论框架下，十几个各种名目的川康考察团、考察队在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建省的前后纷纷启程西行。

当时全权负责抗日战争物资资源总调配的干部名叫钱昌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资源委员会的一把手。面对十几批西行茶马贾道的考察团所获得的不尽如人意的结果，钱昌照和郭有守两位泰斗共同决定，由郭有守亲自出马，组建一个高规格、大规模的考察团，对茶马贾道沿途的税源与资源做一次深入细致的大考察。

高规格、大规模的考察需要高层次的学者群体参加，自然也需要许多经费。为此，郭有守和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博士找到了杭立武博士。杭立武博士本科毕业于金陵大学，是陈裕光博士的亲妹夫，他当时担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执行董事和总干事，实际握有调度分配中英庚款的权力。面对郭有守为了考察而“要钱”的请求，杭立武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一个当时规模最大、参加学者层次最高、名称叫作“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的团体成立了。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各地的十几所著名大学的40多位学者，应邀从各自的所在地出发，于1939年6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先后赶到当时西康省的名埠雅安报到，学者们在雅安组成了多个专业组，分头开始考察和西进。

1939年的孙明经，当时年仅28岁，却已经有了独立成功拍摄30多部国情调查电影的经历。他是蔡元培、陈裕光、郭有守、魏学仁等学界泰斗为“结束我国没有电影高等教育专职教师的历史”而刻意挑选并共同培养的我国第一位电影高等教育的专职大学教师。

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在决定安排孙明经带着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对茶马贾道进行考察前，多次组织了多学科的学界领袖集思广益，为孙明经的考察提出考察规划与诸多考察课题。

例如在茶马贾道的源头和起点、熊猫故里雅安，要求对活体熊猫进行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例如雅安缘何会成为茶马贾道唯一的源头和起点，对此要进行“过去时”与“现在时”的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在茶马贾道的源头和沿途，要对可资抗日战争使用的资源、税源和潜在的资源、税源以及这些资源、税源的未来前景进行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要对茶马贾道源头与沿途的人力资源以及教育状况即“未来人力资源素质”状况进行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对茶马贾道的“古道”与“今道”的具体道路与交通状况进行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对茶马贾道源头与沿途的吏治状况与面貌进行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对茶马贾道上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贮运、中转、贸易、税收的所有环节、框架和细节进行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对茶马贾道源头与沿途的民情、民俗、民族、宗教进行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考察……

193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物资条件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不仅大片发达地区被日军占领，我国以往长期对外交往所依靠的上万千米海岸线也几乎全部落入敌手。在那段中国人自己连一英尺电影胶片 and 一卷照相胶卷也不能制造的岁月里，绝大部分大上海的电影人撤到了重庆，由于没有电影胶片，无法拍摄电影，仅能演出话剧，于是，大上海的电影人们在重庆创造了中国文化历史中辉煌的“中国话剧黄金时代”。

就在大上海的电影人仅能在大后方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时，钱昌照、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等学界泰斗在1939年6月居然一次性给予孙明经多达12000英尺的16毫米电影胶片以及多达200个的照相胶卷！此次考察的意义不言而喻。

为何对茶马贾道的考察在“用脚踏、用脑思、用口问、用笔记”之外，泰斗们

还要专门派遣年轻的孙明经去用电影和照片的形式来记录？

因为，当时只有电影和照片，才能让大后方层层官员、学者，以及广大军民都真真切切地看到茶马贾道上那能长期支撑抗战的滚滚税源与资源。试想，在1939年6月，一次性获得如此多的电影胶片和照相胶卷，这对年轻的学者孙明经来说是何等重任。

在学界领袖们群体智慧的引领下，孙明经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一路上他风餐露宿，还常常不惜冒死独行，甚至当考察团在原定考察路线半途遭遇“兵灾”全团折返时，毅然不顾个人安危独自继续深入。最终，他完成的实际考察路程超过原定路线多达千里。

为使此次考察能得到刚刚成立的西康省的主席刘文辉将军的大力支持与理解，考察团的名称最终确定为“川康考察团”，集合誓师出发地确定在刘文辉将军每年办公大部分时间的驻地——雅安城。

三、茶马贾道和茶马古道名称的由来

茶马贾道历史久远，经过的路途漫漫，地域辽阔，人迹罕至。对世代生息于我国东部低海拔地区的孙明经来讲，这一切都异常陌生。因为他手握着那年月里那么多大上海电影名流可望而不可即的电影胶片和照相胶卷，因此在出发前必须实实在在地做足大量的功课。幸运的是，学品、人品向来是孙明经学习楷模的钱昌照、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等几十位学界领袖纷纷拿出自己的研究所得或自己希望研究和需要实地考察求证的问题，一并交给孙明经。孙明经用4个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地消化和吸收这些所得和问题。1939年6月，当他带着12000英尺的16毫米电影胶片和200个120照相胶卷从重庆出发时，已经怀揣一份详细的考察电影的拍摄提纲和必须在这次考察中用拍摄来求证的内容的预案。

其中，茶马贾道或茶马古道名称的由来和内涵，是第一个让孙明经感兴趣与好奇的问题。

既然名为“茶马”，这条道路必然与茶和马关系甚深，也必然与茶和马相关的人、事、史、俗、吏治、贸易，特别是路的状况、面貌、沿革及路的管理与因路而生的各种税收与物产相关。

当时泰斗们给予的答案是——这条路因“茶马互贾”而生，因此自古以来便名为“茶马贾道”或“茶马市道”。被称为“茶马古道”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贾”字与“古”字同音；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茶马互贾”的商道存在历史久远，到了后来，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大批学者通过这条道路到达大渡河以西各地办学校、办医院、办教堂，而当时美国建国仅有一百多年，洋学者中便有人称其为“茶马古道”。事实上，在1939年，中国的学者们仍多称其为“茶马贾道”或“茶马市道”，而美国学者则有人明确地称其为“茶马古道”。孙明经老师曾针对此问题教导笔者：“这条从西汉汉武帝时期就有记载人们大批量在此用边茶贾藏马的道路至20世纪初至少已经存在两千多年，美国学者中有人坚持称其为‘古道’，很自然；我们中国已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学者中有人不以两千年称古，也属自然。今天我们大家人人叫作‘铅笔’的笔里边并没有铅，大家还是这样叫了，明明与铅无关的笔，也就正式命名为铅笔了。这一条两千多年来明明是贾道的道路，现在不仅我们中国自己有人称呼它为‘古道’，连洋人学者都叫它‘古道’了。虽然经历两千多年的道路，今天叫它‘古道’也无不妥，但其实叫它‘贾道’才正确……”

当然，泰斗们还有一种说法——把茶马贾道听成或说成茶马古道，是“白字先生”把“贾”字误听成“古”字以讹传讹的贻误所致。

什么叫“茶马互贾”？泰斗们的回答如下：据记载，自西汉以来，人们把以今天的雅安城为中心的川西地区（1939年时称为“康东”，即西康省东部地区）出产的当时名叫“边茶”的茶叶，运到历史上被叫作“打箭炉”（1939年1月开始正式定名为“康定”）的地方，在那里，汉族茶商们用茶和康藏茶商们进行交易，即所谓“互贾”，康藏茶商们用藏族地区出产的马为结算的“货币”，这种以茶贾马或以马贾茶的贸易自古便被称为“茶马互贾”或“互市”。

因此，茶马贾道自西汉有记载以来，分为两部分或称为两大段落。第一部分在打箭炉以东，源头在今天的雅安，终点在1939年以前的打箭炉，此为茶马贾道的东段。在此段落内，茶被称为“边茶”或“康茶”。第二部分以打箭炉为起点，向西

延伸，称为西段。西段又分为东道、北道、中道、南道四路。在此段落中，经过康藏茶商们在打箭炉的锅庄内再加工重包装过的边茶，其名称变为“藏茶”。

藏茶出打箭炉北关，从此分道扬镳，以东、北、中、南四路，翻越千山万水深入康、青和藏区，成为康、青、藏三个地区内以藏民为主的各民族人民离不开的酥油茶的主要原料。

1939年时，泰斗们的研究成果中，对“康”的解释为“边地的古称”。今天的川西地区，对秦汉时代的中原而言是边地，也是杂居西南的各族相对汉民族中原传统生息地的“分野边界”。因此，以今天雅安为中心的川西地区，自古出产的茶叶便被命名为“边茶”或“康茶”。

1939年8月孙明经到达康定时，康定周边地区和康定以南生活居住的各族群消费的以康定为集散地的茶，当地的茶商、官员、各族住民也称其为“边茶”或“康茶”。

四、对茶马贾道打箭炉以西贾道的简介

今天的康定，因一曲《康定情歌》名扬寰宇，然而，在1939年1月以前，康定的正式名称叫作“打箭炉”。当年，泰斗们对此地名的解说为：“‘打箭炉’为藏语发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两河汇流处的商贸集散地或大商埠。有人不知原委，附会为因诸葛亮命人在此造箭而得名，此误说流传甚广。”

打箭炉是一座面积不大的小城，所有从此西运的藏茶，都要先出北关办理“税引”后启运。

东道：从打箭炉的北关出发，向北经八美转向东北至终点丹巴。

北道：从打箭炉的北关出发，经八美向西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各集散地，越雀儿山口，最后经青海省的玉树到达终点格尔木。

中道：从打箭炉的北关出发到达甘孜后，西行至德格转西南渡金沙江，到达今天西藏的昌都（1939年的昌都在西康省辖区范围内），再西行达终点那曲。

南道：从打箭炉北关出发一路西行，至雅砻江东岸雅江渡口待渡。渡江后，经